

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黨派

• 何 蜀

雖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再強調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是整中共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文革第一個被用來「開刀祭旗」的受害者，卻是著名歷史學家、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他被公開點名批判時，不僅是中共黨員，北京市副市長，而且是民主黨派領袖和元老，身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員的黨派職務。此外，最先揪出的所謂「三家村黑幫」三人中，一人是吳晗，另一人是中共北京市委專與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打交道的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也就是說，「三家村」中有兩人與民主黨派有關。這一事件預示了民主黨派在文革時期的命運。

一 紅衛兵發出最後通牒，民主黨派停止活動

1966年「十六條」公布後第十天，得到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運動如狂飆驟起，終於將打擊的矛頭公開指向了各民主黨派。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從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紛紛貼出「通告」，以大體相同的語言表示「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報請黨中央處理」^①。北京的這股紅色風暴很快就颳到全國各地，民主黨派在全國陷入滅頂之災。

據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金城回憶^②：

紅衛兵對各民主黨派機關發出「最後通牒」，「勒令」各民主黨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愛國人士、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面人物，非黨高級知識份子被抄家、被揪鬥。紅衛

1966年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從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紛紛貼出「通告」，以大體相同的語言表示「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報請黨中央處理」。民主黨派自此陷入滅頂之災。

兵中的一些不良份子趁機打家劫舍，令人髮指的殘忍行為到處出現。恐怖氣氛籠罩着各大城市。

而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並沒有對紅衛兵「勒令解散」民主黨派這一重大行動明確表態。

周恩來曾在9月2日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對紅衛兵提出十條要求，其中一條載有「對於在國家和統一戰線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只要沒有發現現行反革命活動，應該加以保護」。次日上午他召集中央領導人開會研究，這份文件因遭到康生等人反對而沒有通過。9月14日，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了「關於抓緊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關社會政策問題的通知」，其中列出當前急需解決的八個方面問題中，就包括「對民主黨派、民族資產階級、工商聯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周恩來作了多次修改後，交中央文革小組，請他們先行派出各報記者或其他工作人員調查研究、收集材料，準備國慶節後討論解決。在9月22日召開的國務院各口、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周恩來又提到包括民主黨派政策在內的若干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國慶節抓一抓。但此事也未見下文^③。

10月3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禮堂對來京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講話中，批評了紅衛兵砸南京孫中山銅像和給宋慶齡貼大字報等錯誤行動，談到有人提出要關政協和民主黨派的門，不要政協，不要民主黨派時，周恩來說：「關一個時期是可以的，房子你們佔一個時期也可以，但不能永遠這樣，不能把東西搞壞。」並明確說「政協還是要的」，「毛主席還是政協名譽主席，我還是主席哪！」但仍未對民主黨派的存廢問題作出明確表態^④。

8月27日，由「紅衛兵戰校」(即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發出的《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傳單中，第八點「關於破四舊」說到：「有些重大行動(如取締民主黨派等)應該先動口，向中央、市委報告，在中央、市委的統一領導下再動手，不然會給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動。」從這段話可知，當時紅衛兵「取締民主黨派」的行動受到過來自中共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委婉批評，但未受到根本否定。

在紅衛兵勒令解散民主黨派、各民主黨派停止活動兩個月之後的10月24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匯報會議，他在聽取中央工作會議的匯報時才對這個問題表態。他說：「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向紅衛兵講清楚。」^⑤但是，毛澤東這一講話當時並未公開傳達，事後也未對此加以強調，因此未能像其他「最高指示」一樣產生影響。民主黨派仍然未能恢復活動。

二 民主黨派人士在「破四舊」中遭到殘酷打擊

自「破四舊」狂潮掀起開始，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聲音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和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就一直在為之

在紅衛兵勒令解散民主黨派、各民主黨派停止活動兩個月之後的10月24日晚，毛澤東主持匯報會議說：「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向紅衛兵講清楚。」但是，毛澤東這一講話當時並未公開傳達，因此民主黨派仍然未能恢復活動。

吶喊助威。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好得很！〉，《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做得對！做得好！〉；8月24日，《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在這片「好得很」的歡呼聲中，民主黨派人士受到第一次大規模迫害。

據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所撰《張治中將軍年譜》記載^⑥：

8月28日張治中從北戴河回京，（此時「文革」已開始）回家坐下不到兩小時，紅衛兵即進門抄家。氣勢洶洶，咄咄逼人。以後又來了4次。由於中共中央統戰部事前已打過招呼，所以第一次張還能沉得住氣。第二次，紅衛兵指着張的鼻子質問：「你是甚麼人，是甚麼歷史？」張在久病之後，身體本已極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搖晃着顛巍巍的身子，猛然從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問毛主席去！你去問周總理去！」事後，張對家人和親信說：「若干年後，這將成為一個大笑話！」

當時正在病中的紡織工業部部長、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員蔣光鼐，被一群女紅衛兵抄家。這些女紅衛兵闖進蔣家住宅後，凶狠地叫蔣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廳裏，聽她們宣讀通篇是凌辱言辭的《告民主黨派最後通牒》。然後罵罵咧咧，東翻西找，把稍微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拉走了^⑦。

民盟中央委員、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被紅衛兵抄家後，家門被貼上了「馮友蘭的黑窩」大字標語，兒女均被牽連受到批判，甚至連上幼兒園的小孫子也受到「退園」處理^⑧。

在恐怖浪潮席捲京城的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盛讚紅衛兵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稱「一切藏在牆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民進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謝冰心被抄家後，紅衛兵辦了一個「抄家物資展覽會」，在展覽會文字說明中將謝冰心和丈夫稱作「吸血鬼」。紅衛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築學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將他家中的果醬刀、餐刀、水果刀收到一起，說是「準備暴動」的罪證。梁妻林洙剛想聲辯，就挨了一記耳光。隨後，紅衛兵又從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親房間裏搜出一把鑄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當作梁思成藏有蔣介石贈劍「夢想變天復辟」的罪證——其實那把劍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恆在抗日戰爭中從航空軍校畢業時的紀念品，林恆在對日作戰中壯烈殉國了，痛失愛子的林母因而留下這把劍以作紀念^⑨。

在紅衛兵「破四舊」中受到最典型迫害的民主黨派人士，大概要數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的「大右派」、經濟學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紅衛兵衝擊後不久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說，這是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災禍，從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劃了火柴燒手，用氣槍射擊頭面，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骯髒的食物，用油彩塗臉，用氨水灌鼻孔……^⑩。

在紅衛兵「破四舊」中受到最典型迫害的民主黨派人士，大概要數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的「大右派」、經濟學家章乃器了。他在〈七十自述〉中說，從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受到百般拷打。這是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災禍。

在1970年底，中央國家機關統戰系統軍管組曾按照周恩來的提議，對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紅衛兵查抄的人大、政協機關所屬民主黨派和知名人士的情況進行調查，查明共有68人^⑩。

最能反映民主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運的典型事件，莫過於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的誕生地、被譽為「民主之家」的重慶「特園」遭到了毀滅。

「特園」是抗日戰爭時期陪都重慶著名民主人士鮮英的公館，當年他不顧國民黨當局威脅，經常接納中共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到公館內活動，而被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譽為「民主之家」。郭沫若、馮玉祥分別為之題寫過「民主之家」匾額。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都是「特園」的常客。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談判時，「特園」曾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對外活動場所，毛澤東曾三次親臨「特園」與民主人士共商國是，並在這裏說過：「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裏了！」^⑪「今天，我們聚會在『民主之家』，今後，我們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國』！」^⑫解放後，「特園」主人、民盟中央委員鮮英被劃成右派份子，「特園」從此冷落下來。

文革初期，1966年8月，「特園」被重慶大學赤衛軍查抄。園內挖地一尺，各屋內翻了個遍，大客廳內珍貴的歷史見證物簽名軸（上有抗戰勝利前後到過「特園」的國共兩黨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簽名）不見了，凡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都在查抄封存之列。鮮英的家屬後來從看守他們的赤衛軍口裏得知，鮮宅是當時市領導點名首批抄家名單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衛軍組成抄家隊伍進駐「特園」。赤衛軍總部就設在「特園」^⑬。這顯然不應視為「群眾性自發行動」。後來重慶造反派的兩大派武鬥發展成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特園」的主要建築——接待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並曾多次作為國共兩黨談判場所和中共代表團新聞發布會場所的達觀樓，被其中一派紅衛兵作為武鬥據點。在該武鬥隊戰敗撤退時，因銷毀傳單資料而引起火災，達觀樓化為廢墟。毛澤東讚賞過的「民主之家」被他所提倡的「大民主」毀掉。

「特園」是抗日戰爭時期陪都重慶著名民主人士鮮英的公館。抗戰勝利後，「特園」曾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對外活動場所，毛澤東曾三次親臨「特園」與民主人士共商國是，並在這裏說過：「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裏了！」文革初期，「特園」被重慶大學赤衛軍查抄，後來更在武鬥中化為廢墟。毛澤東讚賞過的「民主之家」被他所提倡的「大民主」毀掉。

三 有關文化大革命與民主黨派的幾份名單

1966年8月30日晨，86歲高齡的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章士釗，因前一夜遭到前來抄家的北京大學紅衛兵的殘暴凌辱和折磨，憤然上書毛澤東，懇求「在可能範圍內稍微圍轉一下」。毛澤東指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立即擬定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名單中列出的12個著名人士，除去中共方面的郭沫若和無黨派的宋慶齡（曾任民革中央名譽主席）、章士釗、傅作義、張奚若外，其餘7人是民主黨派領袖：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潛，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主任張治中，民革中央常委、社會聯繫工作委員會主任邵力子，民革中央常委蔣光鼐，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鍇，民建中央常委、「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周恩來在倉促間寫成的這份名單中，只列入了民革和民建兩個黨派的部分負責人，其他民主黨派無人列入名單。顯然，周恩來在開列名單時主要不是從這些人士的黨派身份上考慮的。在這份名單中還規定了六類幹部（外加李宗仁一人）為保護對象，第五類即

「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只是這一「負責人」的含義不像其他幾類幹部如「副委員長、人大常委、(政協)副主席」、「(國務院)部長、副部長」等那樣明確(直到兩年多之後，周恩來在致國務院直屬口軍代表的信中才寫明了「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即他們的中央委員、省市黨部委員」^⑭)。

許多文章在談及這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時，都只談到其重要意義而未具體考察其實際作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特定時期，連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也常常被加以各取所需的理解而得不到認真執行，更何況這樣一份名單？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屬名單中明確規定的第二類保護對象，卻在這份名單提出四個月之後在殘酷鬥爭中被迫害致死。即使是列入這份名單中的幾位民主黨派領袖人物，也並未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如蔣光鼐、張治中雖然沒有受皮肉之苦，但精神上仍受折磨，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先後在抑鬱中去世。蔣光鼐是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第一個中共黨外部長級幹部(紡織工業部部長)，時值大動亂的1967年6月，以致有關工作人員竟然沒有以周恩來的名義給追悼會送花圈，在追悼會後受到周恩來嚴厲批評。張治中病危時，其一女二婿正被隔離審查，經周恩來與專案組交涉，張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臨終前的團聚^⑮。

而名列保護名單上7位民主黨派人士之首的程潛，情況更糟。1968年初，程潛在家中摔成骨折後住進北京醫院，周恩來派來大夫和護士，護士是林伯渠的兒媳婦，是一位很有經驗的護士長。在制訂手術方案後，周恩來批准了。但是很快發生變動，周恩來派來的大夫、護士全部被撤換了，治療方案全部改變，換上來的醫護人員對程潛的態度很粗暴。程潛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員竟說：「你還讓人侍候？像你這種人，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給你貼大字報。」程潛夫人郭翼青後來說：「對於程老的死我們是有懷疑的。因為程老身體本來很好，醫生說基本上恢復了，但醫院突然撤人，改變方案。這裏恐怕會有政治原因的。」^⑯1968年4月9日程潛病逝後，對他這樣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國家領導人」是否應該舉行追悼活動竟無人敢作主。直到周恩來聞訊後作出明確指示，人們才着手籌備追悼活動。追悼會於4月12日由民革中央主持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開得頗為冷清。

周恩來其時因中共高層領導內突發所謂「楊余傅反黨集團」事件而忙碌不堪，以致未能出席程潛的追悼會，直到第二天晚間才抽出時間專程到程潛家表示悼念。這時，在程潛去世的第二天，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此發表的社論〈芙蓉國裏盡朝暉〉和成立、慶祝大會上通過的《給毛主席的致敬電》中，均回顧了湖南的革命鬥爭歷程，但隻字未提程潛為湖南和平解放一事所作出的貢獻，而且在社論中公布的毛澤東「最新指示」，還提出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中共及其領導下的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出現了「國民黨殘渣餘孽」的新提法。在那個形而上學空前猖獗的年代，與國民黨有着較深歷史淵源而且名稱中就有「國民黨」字樣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自然就被許多人視同於國民黨或「國民黨殘渣餘孽」。因此，像程潛這樣的國民黨起義將領是否被算作「國民黨殘渣餘孽」之內，就成了一個讓人擔心的問題。於是，在周恩來向程潛家屬表示慰問時，程潛夫人郭翼青鼓起勇氣問周恩來：「程潛究竟算甚麼人？我家到底算甚麼成分？」當時全場震驚。直到周恩

1966年8月30日晨，86歲高齡的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章士釗因遭紅衛兵折磨，憤然上書毛澤東。毛指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立即擬定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名單中列出了12個著名人士。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特定時期，連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也常常得不到認真執行，更何況這樣一份名單？

來回答：「頌公當然是革命幹部嘛！」「你們家庭當然是革命家庭嘛！」程潛所有在場親屬才如釋重負^⑦。

但是，周恩來的這個表態只是對程潛一人而言。反觀同樣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貢獻的湖南軍政界耆宿、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就受到了另一種對待。據唐生智的外孫女艾曉明回憶：當時正在接受審查的唐生智從報上看到程潛去世的消息，感慨地說，頌公死得值得，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都出席了追悼會（引者註：此說有誤）。這話被匯報到了造反派那裏，省政協的一個年輕造反派頭頭，竟跑來打了年已八旬的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唐生智一記耳光，還責罵：「你還想這種待遇麼？」^⑧

與這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相對立的，還有另外幾份與民主黨派有關的名單。

1980年11月2日，在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查長兼特別檢查廳廳長黃火青宣讀的《起訴書》中第5、6兩條指控：1968年8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軼歐指使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郭玉峰，編造了《關於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四屆政協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兩個報告都經康生親筆修改、審定，將115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的60人和159名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中的74人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務嫌疑」、「國特」、「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走資派」、「三反份子」、「裏通外國」等。在這兩份「黑名單」中，民主黨派人士被列入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胡子昂，民革中央秘書長梅龔彬，民革中央常委、宣傳部長王昆侖，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致公黨中央主席陳其尤，民革中央常委陳劭先，九三學社中央常委趙九章，九三學社成員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胡厥文，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員劉清揚，民革中央常委朱蘊山，民建中央常委、民建遼寧省委暨瀋陽市委主任委員鞏天民，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圖南，民盟中央常委、宣傳部長薩空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孫起孟，民進中央副主席車向忱，民建中央秘書長孫曉村，民革中央常委朱學範，民革中央常委劉斐，民建中央委員、民建雲南省委主任委員寸樹聲，民盟中央常委吳鴻賓等。

《起訴書》中指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第38條罪行即是對民主黨派的迫害，其中指出：

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遭到誣陷、迫害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鄧寶珊，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吳晗，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委員孫起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車向忱，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周谷城，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的中央常委、委員和候補委員大批受到誣陷、迫害，黃紹竑、梅龔彬、楚溪春、高崇民、劉清揚、潘光旦、劉王立明、劉念義、王性堯、唐巽澤、許崇清、李平心、陳麟瑞、鄭天保、王家楫、劉錫瑛、張璽、王天強等被迫害致死。

周恩來因事未能出席程潛的追悼會，直到第二天晚間向程潛家屬表示慰問時，程潛夫人郭翼青鼓起勇氣問周恩來：「程潛究竟算甚麼人？我家到底算甚麼成分？」當時全場震驚。直到周恩來回答：「頌公當然是革命幹部嘛！」「你們家庭當然是革命家庭嘛！」程潛的親屬才如釋重負。

《起訴書》中所列舉的「被迫害致死」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職務分別是：黃紹竑，民革中央常委；梅龔彬，民革中央秘書長；楚溪春，民革中央副秘書長；高崇民，民盟中央副主席；劉清揚，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員；潘光旦，民盟中央常委；劉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員；劉念義，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書長；王性堯，民建中央委員、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唐巽澤，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員；許崇清，民進中央常委、民進廣州市委主任委員、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廣東省委主任委員；李平心，民進中央委員；陳麟瑞，民進中央委員、民進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鄭天保，致公黨中央常委、秘書長；王家楫，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劉錫瑛，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張璽，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九三學社青島分社主任委員；王天強，台盟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員。

這份「被迫害致死」的名單並不完善，比如其中就缺少農工民主黨人士。其實，農工民主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樣大有人在，如該黨前中央主席章伯鈞，該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兼秘書長郭則沉、中央委員黃琪翔等人，都應列名其中。此外，這份名單裏提及的主要是各民主黨派的中央及省級領導人，尚未包括其基層幹部和普通黨員。

四 民主黨派人士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

1966年國慶節前，周恩來曾打算向參加國慶觀禮的高級民主人士說明和解釋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以幫助其「理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金城奉命通知有關民主人士。可是，毛澤東檢閱遊行隊伍的慶典結束後，民主人士在天安門城樓上休息廳裏苦等了半個多小時也沒見到周恩來，最後只好滿腹狐疑地離去。事後方知，那天毛澤東因為廣場上人們的狂熱歡呼而一時心血來潮，走下了天安門城樓，走到人群中去了。周恩來只好緊跟着毛澤東以保護其安全^⑨。一次與高級民主人士的談話會，就因毛澤東這一隨意性的舉動而告吹。不過，儘管那天周恩來與高級民主人士的談話會未能開成，儘管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他們出於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高度敬仰與信任，仍然竭力讓自己去理解、去「緊跟」。

這方面的例子不少。如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蔣光鼐抱病去天安門城樓參加接見活動。周恩來問他抄家情況，他為了表示對毛主席支持的紅衛兵有正確態度，只好淡淡地回答：「來過了，不過還斯文。」同年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張治中時問：「紅衛兵到你家沒有？」張治中說：「去了。」毛澤東有些驚訝：「啊！你既不是當權派，更不是黨內的當權派，他們到你家裏幹甚麼？」張治中也沒有趁機申訴。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問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胡子昂挨鬥情況，胡子昂撒謊說沒挨鬥^⑩。

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是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典型。當清華大學紅衛兵分裂成兩大派後，不管哪一派都要揪鬥他。他對此不但不氣憤反而高興，因為他天真地認為這是學生們不再打內戰，開始聽毛主席的話，搞「鬥批改」了^⑪。張治中病危之時，於1968年10月10日口授的「遺囑」中留下了這樣的話：「尤其經

出於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高度敬仰與信任，民主人士竭力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是一個典型。當清華大學紅衛兵分裂成兩大派後，不管哪一派都要揪鬥他。他對此不但不氣憤反而高興，因為他天真地認為這是學生們不再打內戰，開始聽毛主席的話，搞「鬥批改」了。

過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社會面貌，人的面貌，都起了劇烈深刻的變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並認為自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確實是沒有甚麼遺憾的」^②。從這份打着深深的文化大革命烙印的「遺囑」可以看出，民主黨派人士是何等虔誠地要求自己「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擁護這場文化大革命。

五 民主黨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後的命運

隨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深入，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不斷呼籲「掌握鬥爭大方向」，搞好「革命大批判」，引導紅衛兵和造反派將打擊矛頭指向中共「黨內走資派」。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民主黨派就躲過了劫難，因為他們的歷史就是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的歷史。

在當時的「揪叛徒」惡浪中，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等人於1967年製造了所謂「新疆叛徒集團」冤案，誣陷在1942年和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逮捕關押、抗戰勝利後獲釋的中共幹部131人「投敵叛變」，並將打擊矛頭指向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康生甚至說這是「叛徒」和「國民黨」張治中相勾結，好在共產黨內潛伏下來。張治中聽到這個說法後，悲憤地說：「這怎麼可能？這不是沒有了是非黑白了嗎？」^③

周恩來在對紅衛兵談話中說明了新疆出獄一事的經過：張治中是受他之託，將一批被國民黨關押的中共幹部釋放，黨中央早已做了結論；張治中才幸免於難，但精神受到打擊，健康日趨惡化。當年由他釋放並精心護送回延安的馬明方、張子意、楊之華、方志純、高登榜等92名中共高級幹部仍被立案偵查、批鬥迫害。馬明方等26人更被迫害致死。

張治中畢竟因被周恩來列入「應予保護」的名單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但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則因中共黨內的劉少奇、賀龍兩大冤案而被迫害致死。唐生智的外孫女艾曉明回憶：1968年2月，中央軍委文革專案組到長沙，要唐生智檢舉1927年劉少奇命令武漢工人糾察隊交槍一事。在此之前，已有人找唐生智數次個別談話，逼他檢舉此事。唐生智只知道武漢工人交了槍，但究竟是工人自動交的還是奉誰之命，則不得而知。由於他不願無中生有，因而受到審查逼供，白日交代，夜裏反省，有家歸不得。專案人員又反覆啟發提示，要他檢舉賀龍的所謂歷史問題。專案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槍威脅唐生智^④。

張治中與唐生智都是因中共黨內的冤案牽連而受到迫害。在這場重點打擊中共「黨內走資派」的運動中，卻另有一個以民主黨派人士為主要打擊對象的重慶「一號專案」。

自1968年9月至1971年9月，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以「清查武鬥黑手」、「清理階級隊伍」名義組織了一個所謂「管訓隊」，集中管訓以民主黨派成員（其中多為起義、投誠的原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吏）為主的「牛鬼蛇神」236人，對他們進行法西斯的刑訊逼供，不僅「挖出」涉及劉少奇、賀龍、葉劍英、楊尚昆、李維漢、張友漁等中共高級幹部的所謂「政歷問題」材料數百件，還炮製出一個以三位民革領導人：民革中央委員裴昌會（全國人大代表、國防委員、重慶市副市長）、民

在當時的「揪叛徒」惡浪中，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等人製造了所謂「新疆叛徒集團」冤案，並將打擊矛頭指向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張因被周恩來列入「應予保護」的名單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但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則因中共黨內的劉少奇、賀龍兩大冤案而被迫害致死。

革中央候補委員魯崇義(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人委參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委員、民革重慶市委主任委員夏仲實(全國政協委員)為首的所謂「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反革命集團」嫌疑案，即重慶「一號專案」。

這個天方夜譚式的冤案，誣稱裴、魯、夏等從1967年2月開始即密謀策劃，串連他們解放前的舊部下、舊關係，並請示了「走資派」任白戈(在文化大革命初被打倒的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兼市長)、李止舟、廖伯康(在文化大革命前與蕭澤寬一起被打成「蕭李廖反黨集團」的中共重慶市委領導幹部)的同意，於1967年3月在民革重慶市委禮堂召開了「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反革命組織成立大會，裴昌會宣布集團軍設總部，所轄兩個軍，三個獨立師，總司令裴昌會，副總司令兼參謀長夏仲實，副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魯崇義，第二軍軍長卿雲燦。兵力來源：插手群眾組織；戰略方針：立足四川，發展雲南，聯絡緬甸，迎接反攻。並設專用電台，與台灣、上海、廣州等地聯繫，待機暴動……^⑤。

在長達三年的「管訓」中，冤案涉及的人員從精神到肉體都受到百般摧殘，被強加了「潛伏特務」、「武鬥黑手」、「殘渣餘孽」、「投敵叛國」等諸多罪名。裴昌會等人被迫害致殘，夏仲實等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兩年多之後，這一大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類似這樣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謂罄竹難書，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還作為「要犯」被關入了北京秦城監獄。

除了對民主黨派政治人物的迫害外，對民主黨派高級知識份子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落實政策」，也是另類形式的精神迫害。例如，1969年1月底，毛澤東派駐清華大學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遲群，向全校師生員工傳達了經毛澤東審閱、由中共中央批發全國學習的清華大學所謂「堅決執行對知識份子『再教育』、『給出路』政策的經驗」，這個經驗被稱為「毛主席親手樹立的樣板」。其中說，革命群眾按照毛澤東「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的指示，把清華大學的著名建築學權威梁思成、機械學權威劉仙洲、力學權威錢偉長這三個「反動學術權威」典型批倒了、批臭了，成了「廢品」、「垃圾」。批了之後怎樣「給出路」呢？對梁思成、劉仙洲這樣「年紀太大，用處不大」的人，所給的出路就是「養起來，留作反面教員」。宣傳隊認為這是偉大領袖對梁思成的大恩大德，居然還派人到醫院去向正在住院治病的梁思成當面傳達這個文件。梁妻林洙回憶^⑥：

後來當我翻閱他的筆記本時才發現，從1月26日到2月27日他沒有寫一個字。沉默！這是他的回答。對知識份子來說往往生活上的艱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難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與惡意的嘲弄。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陸續恢復活動，但民主黨派仍未恢復活動。5月4日，周恩來致信國務院直屬口軍代表轉人大、政協軍代表，要求給派往各民主黨派機關的軍代表談談政策。「機關革命造反派的任務是清理機關幹部的隊伍，而不要去鬥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即他們的中央委員、省市黨部委員。如他們中間出現了現行的反革命份子，自當別論，但也需先報告軍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會同意後，方能採取行動。機關幹部也要在清理隊伍時，按具體情況區別對待，不能以中共黨內標準要

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落實政策」，是對民主黨派高級知識份子的另類形式的精神迫害。例如，革命群眾按照毛澤東「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的指示，把清華大學的著名建築學權威梁思成、機械學權威劉仙洲、力學權威錢偉長這三個「反動學術權威」典型批倒了、批臭了，成了「廢品」、「垃圾」。

求。」◎1970年2月，周恩來對進駐各民主黨派機關的軍代表指示：對民主人士不能那樣隨便揪鬥；如果黨外人士有政治歷史問題，可以背靠背地進行審查；歷史問題，既往不咎，如有現行反革命，另當別論。之後，又幾次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把已下放勞動的民主黨派人士中的中央委員以上人員，從幹校抽調回來◎。從周恩來這幾次指示，我們可以從反面得知，民主黨派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決不亞於中共幹部。

六 民主黨派的「十月晉言」

在竭力使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也有民主黨派領導人向毛澤東直接表示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作過曲折的抗爭。

久已臥病在家，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動的張治中，雖然在後來留下的「遺囑」中表示了對文化大革命的虔誠擁護，但1967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澤東時，仍委婉地對毛澤東說：「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現在被打倒的人不止百分之五了吧？」◎在當時，這是無人敢說的話。毛澤東是否回答了張治中？是怎樣回答的？我們不得而知。

程潛在他家附近發現貼出了醜化朱德的大字報和漫畫時十分氣憤，叫女兒趕快用「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將其覆蓋。當社會上開始出現批判劉少奇的浪潮時，他堅持讓服務員把劉少奇的像掛起來，並說：「還沒有取消少奇同志國家主席的職務，為甚麼不能掛呢？」

在當時的形勢下，民主黨派領導人之間已很少往來，以避免是非，但程潛有一天仍然將朱蘊山請來家裏，談及對江青的一些做法很不滿，不知該如何向毛主席進諫。朱蘊山勸告他千萬不要寫信，以免落入江青一夥手裏，最好是有機會見到毛澤東時當面直言。程潛和毛澤東的關係一直很密切，以往他每次提出見毛澤東，都是有求必應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提出見毛澤東的請求都沒有回音，使他失去了「進諫」的機會。

1972年10月，幾位著名高層民主黨派人士共同向毛澤東和中央提意見，亦即所謂的「十月晉言」。事緣林彪事件之後的1972年夏，毛澤東的姨表兄王季範在京病重，作為王季範的學生和摯友，民盟中央委員、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員周世釗專程進京探望。王季範去世後，周世釗在追悼會上致悼詞。此後，周世釗在京拜訪了一些老朋友，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進中央副主席楊東莚、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圖南、民盟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部長薩空了、民盟中央常委李文宜和胡愈之夫人、民盟中央常委沈茲九等。大家無不為國事擔憂，並達成了要向毛澤東上書言事的共識。於是，周世釗通過王季範之女、當時常在毛澤東身邊擔任翻譯的王海蓉，向毛澤東表示想要「晉言」的意思。隨後，幾位民主人士在胡愈之家中進行了認真商量，並決定：為避免有人與負責外交工作的周恩來為難而不談外交問題；為避免犯江青的忌諱而不談文藝問題。最後由胡愈之將要談的問題歸納為廣開言路、教育問題、青年問題三個方面，並確定了由胡愈之、周世釗、楊東莚分別進行準備。

1972年10月，幾位著名高層民主黨派人士共同向毛澤東和中央提意見，亦即所謂的「十月晉言」。當時，他們在胡愈之家中決定：為避免周恩來為難而不談外交問題；為避免犯江青的忌諱而不談文藝問題。最後由胡愈之歸納為廣開言路、教育問題、青年問題等三個方面，並確定了由胡愈之、周世釗、楊東莚分別準備。

10月2日晚，王海蓉陪同周世釗到中海見毛澤東，周世釗當面遞交了他於8月5日就寫好的近四千字長信，信中談了八個方面的問題：嚴懲林彪集團中罪行特別嚴重的頭目；落實幹部政策；解放知識份子；總結解放軍支左的經驗教訓；青年教育問題(包括恢復共青團、少先隊)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嚴重後果；恢復尖端科學研究，除恢復理工科大學外還要恢復文科大學；開放書禁，改變青年工人、農民和學生除政治理論外沒有其他書可讀的狀況；設立受理群眾申訴的機關，健全法制^⑩。周世釗向毛澤東反映了對當時形勢的一些看法，長談了3個小時，並轉達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見面晉言的願望。毛澤東指定汪東興去聽取意見。

於是，從10月3日下午到10月5日下午，汪東興聽取了這幾位民主人士的意見。其間，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業務組負責人的華國鋒前來聽過一個半天。談話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李金德記錄。胡愈之着重談發揚民主、廣開言路的問題；周世釗着重談教育問題；楊東莪着重談青年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胡愈之在談話中明確提出希望在可能的條件下恢復民主黨派的活動，即使是恢復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動也好，並提出恢復由民主黨派辦的報紙。

至今尚無公開材料可以讓我們了解毛澤東對周世釗的信和這次民主黨派人士「晉言」的看法，但可以確定的是，胡愈之提出恢復民主黨派活動的請求並非全無反響。在「晉言」一個月之後的11月12日，周恩來批准恢復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明確由全國政協、民革中央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出面舉辦紀念儀式^⑪。雖然還只是禮儀性的活動，但是民革這次是以民主黨派身份而不是以「愛國人士」身份出面了。又過了兩年多，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才提到了「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愛國民主黨派、愛國人士、愛國僑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統一戰線」，算是明確了民主黨派在「革命統一戰線」中的名份(儘管仍未恢復其組織活動)。

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民主人士直接向毛澤東和中央提出不同意見的行動，是有背景的。1971年8月27日，毛澤東在長沙與湖南省軍政領導人卜占亞、華國鋒談話，曾談及民主黨派，他說：「你們對民主黨派的問題要研究研究，看還要不要？」「民主黨派還要存在。有的地方說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對民主黨派來說，他們沒有搞翻案，他們也沒有發指示。作為民主黨派來說，還是可以存在的。」還說：「應該把民主黨派的牌子都掛起來」，「把民主黨派搞掉了，有甚麼好處呢？一個『拖』字解決不了問題，存在的問題在他們掛起牌子以後，可以再了解、再調查、再處理嘛」^⑫。大約是得悉了毛澤東的有關講話精神，1971年9月，周恩來指示讓下放到全國人大、政協機關「五七幹校」勞動的民主黨派中央委員返回北京；1971年底中共中央在京召開上層愛國人士座談會，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揭批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一系列文件及林彪事件後中央採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會議期間，周恩來詢問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體和生活情況，肯定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要做中國共產黨的「評友」，但是並未提及民主黨派恢復組織活動的事^⑬。

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楚圖南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談及「十月晉言」一事時說：「據說這些問題都被詳細記錄下來，並上報了，但卻無結果，並且得到相反的反應。」^⑭

至今尚無公開材料可以了解當時毛澤東對「十月晉言」的看法，但可以確定的是，胡愈之提出恢復民主黨派活動的請求並非全無反響。在「晉言」一個月之後的11月12日，周恩來批准恢復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明確由全國政協、民革中央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出面舉辦紀念儀式，算是明確了民主黨派的名份。

自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民主黨派「萬馬齊喑」，很難再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制訂的國家大政方針提出不同意見。1972年「十月晉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見，不僅要算是民主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層、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爭，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運動以後民主黨派最大膽的一次「參政議政」行動。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書一筆的事件，也是民主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光彩的一頁。

註釋

- ①⑤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71；109。
- ②⑩ 金城：〈周總理堅持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二三事〉，《懷念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177；182。
- ③⑪⑭⑰⑳㉑㉒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7-67；423；295；294-95；351；487、503；563。
- ④ 首都大專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隊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長講話選編》，第二集。
- ⑥⑳㉓㉔ 余湛非：〈張治中將軍年譜（下）〉，《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2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頁222；223-24；223；223。
- ⑦ 夏從本：〈周恩來在「文革」中對蔣光鼐的關懷〉，《團結報》，1996年8月3日第二版。
- ⑧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172。
- ⑨⑲㉕ 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頁213；246；257-58。
- ⑩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8冊，總第82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46-49。
- ⑫ 呂光光：〈毛主席和張瀾的會見〉，《重慶談判紀實》（增訂本）（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694。
- ⑬ 鮮述秀：〈我的家特園〉，《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3期，頁29。
- ⑮ 余湛邦：〈大樹陰深蔭弱苗〉，同註②書，頁188。
- ⑯ 廖心文整理：〈周恩來總理與程潛將軍〉，同註②書，頁194-95。
- ⑰ 夏從本：〈程潛辭世前後〉，《團結報》，1995年4月8日第二版。
- ⑱㉖ 艾曉明：《血統：一個黑五類子女的文革記憶》（廣州：花城出版社，1994），頁157；111-15。
- ⑳ 見註⑦夏從本；註⑥余湛邦，頁222；註⑩金城。
- ㉗ 廖廣揚、曾永遐：〈十年沉冤，一朝平雪〉，《重慶文史資料》，第41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 ㉘ 周彥瑜、吳美潮：〈周世釗致毛澤東的一封信〉，《團結報》，1998年1月10日。
- ㉙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頁107-108。
- ㉚ 楚圖南：〈與人照肝膽，見義輕風浪——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人民日報》，1986年1月24日第四版。

何 蜀 重慶《紅岩春秋》雜誌副編審、副主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論著有：〈文革中的「外國造反派」〉、〈文革中第一次大規模武鬥應是重慶「一二·四」事件〉、〈首開大規模武鬥先例的重慶「一二·四」事件〉、〈關於「上海一月革命」的若干史實問題〉、〈「紅衛兵綁架李井泉」始末〉等。